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

道布 照那斯图

一、前言

据河南省登封县文物保管所副所长王雪宝先生介绍，1979—1982年间，少林寺整修院落时，在大雄宝殿月台前，先后发现四通深埋土中的大石碑。其中之一是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刻立的《圣旨碑》。此碑一面刻有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另一面刻有汉文。在王雪宝先生监督指导下，于1988年5月把四通大石碑重新树立在大雄宝殿月台下的庭院中（见本期封三照片）。从此，长期湮没地下的这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蒙古文碑刻得以重见天日。

王雪宝先生在《中国文物报》1988年第26期（总第88期）第2版上，以《少林寺出土元明大石碑》为题报导了元代《圣旨碑》等四通大石碑出土经过。可以说该文是有关研究少林寺蒙古文《圣旨碑》的第一篇文献。这通《圣旨碑》的出土和这篇报导的发表意义重大，为今人研究此碑创造了条件。

1992年9月下旬，我们到少林寺勘察过这通元代《圣旨碑》。在征得河南省登封县文物保管所和少林寺管理委员会同意后，我们拓下了碑文。在勘察和拓印过程中得到了少林寺住持素喜法师及其弟子德仁和尚的关照。在此谨向给予过我们支持和关照的王雪宝先生、素喜法师和德仁和尚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日本青年学者松川节君和中村淳君曾于1991年1月底到2月初到少林寺考察过这件碑刻，并于1993年5月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的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一文（载《亚州内陆语言研究Ⅷ》，中央欧亚学研究会发行）。他们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了我们，在此谨表谢意。

我们根据亲自勘察所得的资料，对这件新发现的古代蒙古文碑刻进行了研究。现将初步研究结果公布于下，以飨读者。

二、概述

现存河南登封少林寺的这通元代《圣旨碑》，位于该寺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宽敞的庭院中。大雄宝殿西侧为六祖堂，东侧为紧那罗殿。大雄宝殿月台下有八通大石碑，分列甬道两侧。每侧一列四通。我们所考察的元代《圣旨碑》是甬道西侧自北向南排列的四通大石碑中最北面的一通，紧挨在月台脚下。

这通大石碑厚32.5cm，宽118cm，碑身高248cm，碑额高78cm，趺座（又称龟趺）高51.5cm，通高377.5cm。

碑的阴面，碑额环雕盘龙，圭上刻汉字隶书“圣旨碑”三字。碑身刻蒙古文，分四截。上面三截为回鹘式蒙古文，最下面一截为八思巴字。最上面一截刻蒙哥汗于牛儿年（公元

1254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的圣旨,共15行;第二截刻忽必烈汗于鸡儿年(公元1261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的圣旨,共39行;第三截刻忽必烈汗于龙儿年(公元1268年)委付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共49行;最下面一截即第四截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鼠儿年(公元1312年)颁给河南府少林寺、空相寺、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长老、提点、监寺为首和尚的圣旨,共32行。四道圣旨时间跨度达59年。其中前三道属蒙古汗国时代即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前的文件,用当时蒙古族通行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最后一道是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后的文件,这时八思巴字已经颁行,作为国书经常用来书写包括圣旨在内的官方文件。在一件文物上同时保存着蒙古族使用过的两种文字,并且从时间上反映出这两种文字的嬗替情况,此碑当属首例。

碑的阳面,碑额无字,圭为空白,其形制与阴面同。阳面碑身刻汉字,也分为四截。最上截内容与阴面最上截相同;第二截内容与阴面第二截相同;第三截内容与阴面第三截相同;第四截内容与阴面第四截相同。碑身阳面右方自上而下镌有“延祐元年孟冬吉日立”九字,表明上述四道圣旨合刊一石的时间为公元1314年。

碑身东侧面刻有竖写的两行汉字,字体较大,为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一位名俞安期的人与少林寺无言禅师参印宗旨后的题字。西侧面刻有竖写的八行汉字,字体较小,为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李志惠等人进谒名山后的题字。这两款题字虽然与《圣旨碑》内容无关,但是可以证明,一直到公元1599年即16世纪末,此碑尚屹立在少林寺中。

从碑文所用的语体看,阴面的蒙古文,无论是回鹘式蒙古文还是八思巴字,都非常明白通顺,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当时蒙古文文献风格一致,属于标准语体。而阳面的汉文则属于所谓的“元代白话”,不是当时的汉语标准语体。“元代白话”是一种以汉语北方话为基础,在词汇和语法上受蒙古语影响较深的一种汉语白话变体,不熟悉蒙古语的人很难读通。我们考察元代用汉文起草的官方文件,大抵使用汉语文言,如《竹温台碑》、《张氏先茔碑》、《忻都公神道碑》、《兴元阁碑记》等件。据此我们推断,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原文是用蒙古文起草的,然后从蒙古文翻译成汉语白话。

从内容上看,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颁发给寺院僧侣的护持文书,此碑亦属首例。可以说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填补了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让我们见到了远在八思巴字护持文书出现以前,蒙古大汗们就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过圣旨,颁发给寺院长老作为护持文书。而护持文书的程式,从最初的回鹘式蒙古文文本到八思巴字文本的演变传承,此碑提供了重要情况,这也是使人大开眼界的。

三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的蒙哥汗圣旨,时间仅次于现存的《也松格碑》和《贵由汗玺文》,属于早期,弥足珍贵。在发现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以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过直接与忽必烈汗有关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此碑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两件由忽必烈汗颁发的圣旨,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喜悦。

从蒙哥汗的圣旨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对佛教是采取保护政策的,并且以任命僧官的形式来巩固佛教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少林寺作为中原的一座名刹是受到蒙古族统治者高度重视的。

在忽必烈汗颁发的圣旨中,对属于禅宗的佛教僧侣与藏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佛教僧侣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僧俗之间的诉讼、审判问题,都有规定。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很好的材料。

此碑所载八思巴字圣旨的颁发时间为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三月十三日。这是武宗海山卒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普颜笃皇帝继承皇位的第二年。是迄今所见普颜笃皇帝八道同类圣旨中最早的一道（其它七道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1991年）。由此可见，中原少林寺等五座禅宗寺院受到仁宗普颜笃皇帝的优先重视。

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为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给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可以通过蒙汉对译的圣旨文本判定一系列词语的确切意义，解决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问题，同时也可以对吸收汉语借词的规律进行探讨，了解当时汉语对蒙古语影响的程度。

语言是在缓慢地演变着的。从蒙哥汗时代和忽必烈汗时代到今天，蒙古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词汇上，古今的差异很大。但是就一个词来说，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为我们研究蒙古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趣的材料。譬如“村子”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是 *toshon* 或者 *ail*（见《蒙汉辞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而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中是 *sildegen*（原文作 *sildegedün*，是复数领格形式，词干应为 *sildegen*）。这种说法在元代的八思巴字文献和元明时期的各种“译语”类词汇集中还都保留着。在八思巴字文献中是 *šilde^ˆed-un*（复数领格形式）。《至元译语》地理门：用汉字标注“村”的读音为“信典”；《华夷译语》地理门：用汉字标注“村”的读音为“申迭延”。又譬如“汉人”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是 *hitad*，而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中是 *jauqud*。在元代至顺年间（公元1330—1333年）刊行的《事林广记》中的《蒙古译语》人事门：用汉字标注“汉儿”（即汉人）的读音为“扎忽歹”。但是，从明代初期的《华夷译语》起，在各种“译语”类词汇集中都作 *qitad* 了。在蒙古语中，“村子”一词的演变速度较慢，而“汉人”一词的演变速度较快。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时发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例。

大家知道，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法在早期的文献中不那么严格。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显示了同样的特点。因此，这通《圣旨碑》对研究蒙古文字史也很有用。

总之，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对研究蒙古语言史、文字史，对研究蒙元时代的宗教政策、政治制度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研究少林寺的沿革更有特殊意义。我们认为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未完待续）

（上接第21页）

众多憎恶之，为其取绰号叫做 *ཁྲ་ལྷ་མོ་*（克粗太）（克粗），意为“拳头”。以拳头为名，足见其在文革期间打人之多，武斗之凶。可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名现象的不同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名是一个民族语言、社会、文化诸特征的集中表现。我们在研究藏族人名时，有必要打破过去那种单一、孤立的模式。上述分析与探讨，就是试图通过发掘隐藏在藏族人名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不当之处还请同行专家们指正。